

# 教育数字化战略下中外电影史课程教学探究

尹相洁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中外电影史课程正在教育数字化战略助推下迎来智能技术赋能的新发展契机。本文围绕中外电影史课程教学展开研究，一方面着重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引入中外电影史课堂后所产生的数据挑战。另一方面基于网生代大学生群体的参与式互动需求，合理探究AI赋能下的史论课程教学创新途径。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中外电影史；教学改革；人文教育

中外电影史是艺术类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同时，它也是其他艺术类专业提高人文素养的通识类选修课。面对社会发展的数字化浪潮以及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战略性转变，对于中外电影史这种特殊的史论课程来讲，除了传统电影史课程本身的局限之外，还将面临更多的技术挑战和数据难题。传统课堂上，授课教师大多会借助于基础电影史教材或者经典电影片段为载体，开展电影史课程教学。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一种单向度的知识传递，虽有其合理性，但学生大多并没有掌握到影片历史背后的文化生活或者美学意味。在当下，人工智能正与高等教育逐渐深入结合，电影史教学也迎合时代潮流与新技术应用同步发展，但课程也面临内容更加过载、数据更加分散、授课难度增大等问题。课程的人文教育内核也面临被技术干扰的风险。对此，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构建良性教学体系，如何以更开放、包容和更具科学性的方法应对时代变革，成为当前艺术类高等教育中外电影史课程教学改革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

## 一、教育数字化战略下的电影史课程及其数据挑战

### （一）教育数字化与中外电影史课程困境

2022年，国家教育部决定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伴随OpenAI研究实验室开发的深度学习模型ChatGPT的不断升级，2025年1月，国产的DeepSeek App在美国和中国区App Store免费榜双登顶，超越ChatGPT、Google Gemini等国际竞品，成为史上最快达成3000万日活的AI应用。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中提出“四横五纵”资源布局，全面推进智能化，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从教学角度考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断为教学手段加成，对教师和学生信息化的

能力要求也不断提升。可以说，这一“人工智能+教育”的前瞻布局，是继“互联网+教育”后的又一重大推进，将对我国高等教育艺术类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影响深远。当下，生成式AI技术正逐渐应用于课堂互动实践，教师和学生们在享用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中外电影史课程教学的数据挑战也始终存在。

从课程内容来看，中外电影史课程通常以横跨百年的全球影视的历史发展为教学内容主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分配较少，新老教材虽适用于授课，但知识体系总体依然维持线性历史框架。以笔者所在的南京传媒学院为例，在戏剧影视学文学专业，中外电影史课程可被拆分为“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授课时长总计64课时，在其他相关艺术类专业如表演专业的中外电影史课程，总体授课时长为32课时，而作为人文通识课时，则可能是16课时。不同的课时分配之下，课程内容必然有所筛选。以中国电影史为例，大多教材仍以代际时间线划分中国电影史课程，从早期中国电影探索，左翼时期再到抗战时期等等，所谈及优秀影片则大多局限于上海电影。作为电影史研究热点的区域电影史的讲授则被课时所限制。正如电影学者檀秋文所指出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就会发现，在书写中国电影110多年的发展历程时，始终面临着如何整合‘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分割’的难题。”<sup>[1]</sup>除此之外，中外电影史的知识数据则更加广阔，涵盖各个国别，从卢米埃尔兄弟的单镜头叙事到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美学变革、亚洲电影的崛起等等，也包含电影运动革新和跨文化、跨媒介影视文本的深度解读。面对如此庞大和宽泛的知识体系，中外电影史教学就像用零散的拼图还原一幅巨型历史卷轴，然而在课堂上，授课教师手里的数据资料却常常是“碎片化”的。

原因在于，授课教师和学生的电影史资料获取过程较为分散。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电影史数据散落在IMDB、豆瓣电影等商业平台、各国的电影资料馆、档案馆以及各国高校的学术数据库中，形成“数据孤岛”。授课教师所使用的影像资源和历史资料则受限于版权，用于课堂演示的电影案例片段可能是标清修复版，也可能是翻译错误版。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授课教师的常规操作是用U盘拷贝几段经典影视片段，在教学设计中将纸质教材的观点穿插其中，再拼贴一些剧照。这是一种基于文本分析和影片观摩的知识传递模式。这种传统知识传递的演示过程是拼盘式的，往往会让学生对电影史的知识印象停留在线性扁平的历史发展层面。另一方面，学生在数据媒介平台获取的对电影的解析存在信息茧房。在我国，各个媒介机构自有算法体系，如抖音的用户推送机制、微博的热搜议程设置等，在电影方面，相对大众化的豆瓣电影评分虽能大致体现观众取向，学术性资料却是零散状态，国外的IMDB数据虽详细，却缺少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关照。面对以上问题，智能技术的普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效率，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 （二）智能技术优势与新的数据挑战

在中外电影史课程讲授的过程中，整合历史资料的过程常常由授课教师来完成，生成式ai技术接入中外电影史的课堂后，学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经典影片场景可以虚拟还原，传统的知识传递模式则被技术变革逐渐消解和收编，向数字化课堂转型，上文所述“数据孤岛”在“深度求索”的思考和筛选中被整合为可以多样化拆解、合成的“结论”。然而，我们在面对技术带来的“便捷”时，其中的局限和隐患也必须正视。

当下几种语言模型的推理虽强大，由于电影史知识的史料特殊性和数据来源的分散性，其“结论”的准确与否仍需推敲。除却人工智能系统编造史论数据、虚构文献、人物以及背景故事等情况，数据获取过程中，算法的偏见、壁垒与文化的失衡也不可忽略。也许教师和学生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一定程度上整合网络数据资料，但基于现有研究资料和公共网络数据库进行统计训练的大模型输出文本仍存在以往电影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如“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等等，且更易呈现出一种标准化趋势，从而导致学生个性化风格和创新思维的丧失。除此之外，短视频平台也是人工智能深度思考模式会筛选和认证的知识来源，用户对经典影片的恶搞与二创也会干扰ai的知识获取，成为对历史文本的“噪声污

染”，从而导致“教”与“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时间成本损耗，甚至引发争议。而人机交互的迅速与便捷，也在弱化学生面对历史人物的情感共鸣，正悄然消解着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人文教育特质，对教学效果产生阻滞。

总体来看，“数据困境”是所有史论类课程在数字时代必须思考和应对的问题。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sup>[2]</sup>，不过，当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时，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并未停滞，与之同行的是电影史教学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与其停留在当前阶段反复咀嚼，更应展望未来，从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立场考虑，想象技术发展极限的超越能力和对人的影响，让智能技术赋能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互动性强的学习体验。

## 二、AI赋能的教学创新路径：方法论引导与参与式美育

当下，课堂中的大多数学生是网生代的05后“数字原住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大量参与短视频“点赞-评论-转发”的即时互动模式，作为“二次元一代”的他们，“不仅拥有成长于网络时代的个体经验、全球化的想象力和视野，更展现出一种言说自身及其时代和艺术的冲动与尝试。”<sup>[3]</sup>对此，结合学生需求、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以及中外电影史教学实践，电影史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和参与式美育的投入或可成为缓解“教”与“学”的数据困境的有效策略。

### （一）技术赋能的方法论引导：比较、批评与地方

在中外电影史教学中，结合电影史研究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可将宽泛的电影资料检索聚焦具体现实情况和公共性话题，绕开专业、冷僻、易出偏误的历史细节，使得AI推理和提炼内容的准确性提升的同时，延续人机交互过程，学生也能够参与进思考和推理的过程中去，激发问题意识。在电影史研究方法中，比较研究方法能够串联起电影历史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视野，叙事伦理批评方法可以深入电影文本故事背后的文化成因，而以地方为研究方法，则可将宽泛的电影史知识检索限定在特定地理环境之内。比较研究方法是对电影历史发展的跨国别、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比较，在中外电影史教学中，授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使用AI生成不同国家的电影史年表，让学生按照不同国别的电影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和讨论，发掘其中的规律、共性以及差异，再与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本中锚定纵向的历史

节点。其后，在特定历史节点中，选取电影作品和电影活动，对叙事文本中的叙事主体进行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导演、影像与观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作品中伦理成分对观众主体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影响。最后，以地方为方法，重点关注电影创制层面的集群效应，例如近十年来国内外电影界持续关注的“地方新浪潮”。对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着重引导学生借助智能技术深入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景观等等背景知识和共性议题，再从地方电影产业、美学与文化三重维度，立足于中国电影发展和地方创作进行再思考，理解何为创作生态。

总体而言，在数字技术辅助之下，学生作为课程主体，在教师引导下对以上电影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既有利于让学生逐步建构起对电影史发展的立体认知，也能够思考中进一步认清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艺术与产业等事关中国电影发展的多种关系。

## （二）依托数字化升级的参与式美育培养

进入数字化社会，视听媒体的广泛重新配置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渐入佳境，而技术与文化形式、社会结构的交互也在不断深入。当代影视的个性化叙事与审美表达也趋向多元发展。为应对社会发展和行业变化，在中外电影史教学中，通过参与式美育启蒙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化的需求，是十分有利的尝试。

“参与式美育作为一种强调个体通过互动和参与来提升审美素养与创造力的教育理念，在当今社会受到广泛关注。这种教育理念认为，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人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培养审美能力和创造力。”<sup>[4]</sup>在电影史课堂中，由于电影史知识的史料特性，学生对知识的领悟和溯源过程约等于考古的挖掘过程。授课教师可依托数字化智能技术，立足参与式美育教育，为学生的“考古”过程增加参与感和互动性的同时，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持续发展，最终能够实现互动转化和实践落地。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以历史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史料检索，但并非直接对AI给出的史料进行分析，而是带领学生对史料进行可视化溯源。在史料考证过程中，分解电影史中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理解电影人的选择背后的故事，体验一个偶然的决定如何影响电影历史走向，再进一步带领学生使用AI模仿历史文本进行互动，在体验电影人创作过程中，启发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改写。以对外国电

影史初期的电影叙事革新的学习为例，授课教师在讲解时，带领学生进入该时期重要影人大卫·格里菲斯的人生选择，引导学生应用AI对《一个国家的诞生》的争议性话题进行考证，教师用生成式AI实时演示《复仇者联盟》与格里菲斯语法对比，通过VR时间线的深度互动设计，让学生在历史的关键创作节点，通过选择阻止/推动技术革新的演示，切身体验历史发展不同结局背后的人情往事。再引导学生用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模式创作短片剧本，实现对理论知识、历史影响和个性化表达的结合实践。

不论是中国电影史还是外国电影史，历史的文字背后不仅仅是是一个国家、地方的文化形象史，还是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依托数字化升级的参与式美育培养，是用技术理性启蒙学生人文情感，让历史人物成为学生人生观照的有效方式。

##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外电影史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使其具备基础的人文素养的同时，兼具数字技术、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应用的重心不是替代教师讲解和传递知识，替代学生简化学习过程，而在于重构“教”与“学”的关系。在教学中，引入电影研究的方法论指引电影史学习思路，建立参与式互动设计与美育培养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重视电影技术作用，强调研习电影艺术方法的前提下，强调人文，推崇情感性，把电影的人文情怀哺育看作当代电影教育的‘定海神针’，这不唯是睿智的选择，更是切实的把握。”<sup>[5]</sup>

## 参考文献

- [1] 檀秋文. “复线的历史观”与重写中国电影史[J]. 电影艺术, 2020(2): 149.
- [2] 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 陈美延. 金明馆丛稿二编[C].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66.
- [3] 邵燕君, 祝东力, 赵勇等. 新大众文艺与“二次元一代”的经验变迁[J]. 探索与争鸣, 2025, (02): 7.
- [4] 佟彤, 张旭. ChatGPT背景下高校课程教学中的参与式美育: 创新与互动的路径[J]. 科教文汇, 2024, (18): 132.
- [5] 周安华. 银幕是温暖和美善的世界——论新电影教育的人文路向[J]. 电影新作, 2021, (01): 11.